

看世界

巴西演绎“雨林外交”奏鸣曲

□ 单允允

当全球气候代表陆续抵达巴西亚马孙地区的门户——贝伦市，湿热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雨林的气息，更是巴西“气候主场外交”的浓厚氛围。

作为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（COP30）的东道主，巴西总统卢拉专门决定将联邦首都临时迁至这座赤道旁的河港城市，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——这是一场“以实际行动说话”的外交布局，旨在让国际社会亲身体验“地球之肺”的呼吸，为一场陷入僵局的全球对话破局。

巴西将气候议题提升为国家战略核心，并非坦途。其背后是一段从“反面教材”到“正面代表”的曲折历程。

就在几年前，巴西还曾因亚马孙雨林砍伐激增而备受国际社会批评。上一届巴西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与开发优先政策，将亚马孙雨林视为可快速变现的经济资源，其“气候怀疑论”立场导致亚马孙地区环境监管削弱，2019年森林砍伐面积一度激增29%。

结果，伴随全球气候变化加剧，惩罚来得又快又狠：巴西接连遭遇极端高温、强飓风、北部干旱、南部洪涝等异常天气。仅以2024年为例，巴西亚马孙地区发生超过13万起火灾，浓烟一度遮蔽圣保罗天空；受极端暴雨影响，巴西南部稻谷产量降至700万吨，农业经济遭受重创；东北部沿海地区面临干旱、海平面上升与极端天气等问题，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。现实警示巴西，忽略气候代价，经济发展将如沙堡般脆弱。

与此同时，全球气候治理也遭遇挫折——本届美国政府再度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引发贸易摩擦，发达国家迟迟未能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，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挤压多边合作空间。在气候融资、技术转让与责任共担等核心议题上，南北分歧持续加深，谈判进程屡屡陷入僵局。

面对内外挑战，卢拉推出其“雨林外交”三重战略，旨在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，并助推巴西重返国际舞台中央。

第一重，将气候治

理提升为国家核心战略。卢拉就任首日立即重启“亚马孙基金”，并注资104亿雷亚尔（巴西货币，1雷亚尔约合0.19美元）彰显行动决心。更重要的是，本届巴西政府将气候目标深度融入国家发展蓝图。2024年推出的“巴西新工业计划”，通过信贷与补贴推动新能源汽车、电池产业链与生物能源发展，将绿色转型置于再工业化核心。同年8月，《国家能源转型政策》获批，标志着巴西首次构建系统性能源转型框架，推动能源产业从“资源依赖”转向“创新驱动”。

目前这些行动已见成效，为巴西气候外交提供了底气。据《2025年国家能源平衡报告》，2024年巴西电力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高达88.2%，生物燃料、太阳能、风能等清洁能源占比持续提升。

2024年11月13日，巴西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（COP29）上正式提交名为《巴西国家自主贡献：国家贡献和转型的决心》的报告，提出“203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减少59%至67%”的目标。据专业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8月至2025年7月，亚马孙地区森林砍伐面积同比下降11.08%，毁林面积降至11年新低。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长玛丽娜·席尔瓦表示：“我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零森林砍伐。”

第二重，团结全球南方，推动成立“雨林OPEC”。在以往的气候谈判中，发展中国家常因力量分散而难以形成合力。针对这一问题，巴西主动联合印度尼西亚和刚果（金）召开首届“G3气候峰会”。这3个国家拥有全球52%的热带雨林，共同组建“雨林OPEC”能够为森林的碳吸收、气候调节等生态服务争取集体议价权。正如一位巴西外交官所言：“如果世界愿意为石油支付美元，为何不愿为维系生存的森林投资？”此举显著增强了全球南方在资金和技术转让议题上的谈判筹码。

与中国的合作更成为巴西气候战略的关键一环。中国不仅是巴西大豆、铁矿石的主要进口国，更是全球清洁能源技术领军者。当

前，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下设立的环境和气候变化分委会，为双方战略协作提供了机制化平台。巴西在“巴西新工业计划”中重点发展的新能源汽车、光伏与电池产业，恰与中国的产业优势形成互补。两国合作正从传统贸易迈向“生态资源—绿色技术”的深度协同，有望成为推动全球气候合作的示范性伙伴。

中国还从中巴命运共同体高度出发，支持巴西与各方一道，共同推动COP30取得圆满成功。期间，多场边会在COP30“中国角”举行，《中国能源转型展望2025》等报告发布，向与会各方分享中国在绿色转型中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。

第三重，搭建新型合作平台，突破谈判僵局。面对原有谈判框架陷入融资争议的现状，巴西选择另辟蹊径，发起并参与多项议题式联盟。例如，与印度、美国共同发起全球生物燃料联盟，加入全球海上风电联盟，携手澳大利亚、法国、德国等成立全球清洁能源联盟，致力于突破能源转型的融资与技术瓶颈。

在此次COP30上，巴西还推动成立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”，旨在构建透明互通的全球碳市场，将气候行动转化为经济机遇。此外，巴西还启动“多层次治理加速解决方案计划”，加强国家、区域与地方各级政府

“高抱负多层次伙伴关系联盟”的首批联合主席国，目前该联盟已获77国及欧盟认可，显示出全球对多层次气候治理的承诺日益增强。

当然，巴西的“气候调停者”之路也并非坦途。国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持续存在，“亚马孙基金”的规模与雨林保护的实际需求仍有差距，而发达国家承诺的气候资金也迟迟未能全面落实。

尽管如此，从中国的绿色转型到巴西的“雨林外交”，全球南方国家正以切实行动向世界表明，他们不仅是气候危机的受害者，也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。面对依然艰巨的减排压力与融资困境，全球南方国家并未沉默，而是以更积极的作为、更紧密的南南合作与绿色技术协同创新，持续发出坚定声音，推动公平共治。

这条道路或许艰辛，却正为陷入僵局的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不可或缺的韧性、雄心与希望。其探索，不仅关乎自身命运，也在为人类共同的气候未来，开辟一条超越分歧、共筑韧性的新路径。

坦赞铁路迎

“你好！我的中国朋友！”在赞比亚中央省的新卡皮里姆波希车站轨道上，工程师斯坦利·西穆希遇到记者时，用标准的中文打招呼，热情得像久别重逢的老友。

“我们在给车站内部一段轨道更换新的枕木。”西穆希指着远处一群忙碌的工友说。只见工人们正在用套筒扳手、撬棍等工具，将一颗颗钢轨扣件、道钉卸下，移开铁轨，更换全新的枕木。

新卡皮里姆波希站是坦赞铁路的终点站。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，西至此处，由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援建。1976年7月14日，这个车站曾举行仪式，热烈庆祝这条铁路正式移交

给坦、赞两国政府运营。记者在车站内看到一座坦赞铁路终点纪念碑：1860.54369公里。这个标记着铁路全长的数字，是中国5万多人次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，历时5年零8个月，用汗水、鲜血乃至生命，与坦赞两国人民并肩写就的。

“走，我带你去机车库看看，那

里有中国制造的火车头。”已在车站工作20年的火车司机杰克逊·马塞斯带着记者沿着铁轨走到车站尽头。“这里有来自中国、美国、南非的火车头，但中国制造的火车头最好用，动力强劲，可靠性高。”马塞斯说道。

在驾驶室，马塞斯和同事们热情地向记者介绍控制台、电器柜等设备。“看！这里有中文标识。”他指着控制台上的铭牌——“北京东风机车电器厂”。

中国贡献还铭记在坦赞铁路纪念园。这座纪念园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市中心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，在郁郁葱葱的林木间，庄重地保存着中赞、中非人民的共

我的内心总会被深深触动。”纪念园工作人员托比亚斯·林格韦希说，“那些年轻的中国人远离家乡，为我们的国家修铁路，他们是赞比亚人民真正的朋友。”

近半个世纪后，这条承载着中赞、中坦深厚友谊的“钢铁之路”也迎来新一轮升级与

彭立军

2024年9月4日，中坦赞三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《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》。

“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物流、贸易和市场准入方面打开非洲的大门。我们的商品和服务生产商可以进入不同的市场。这不仅对坦桑尼亚、赞比亚和中国有利，而且对本地区和全世界都有利。”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当时说。

随着激活项目的推进，坦赞铁路货运能力预计将提升至每年240万吨，货物运输时间或将缩短近三分之一。

赞比亚交通与物流部长弗兰克·塔亚利日前表示，坦赞铁路的振兴与赞政府建设“陆联国”的愿景一致，将使赞比亚成为中南部非洲物流和分销枢纽。被誉为“自由之路”的坦赞铁路将成为推动区域贸易、创造就业和共享繁荣的引擎。

坦赞铁路局局长布鲁诺·钦安度表示，坦中、赞中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，坦赞铁路未来还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——不仅是运输，更是区域互联互通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的关键纽带。

已在坦赞铁路上服务37年的钱达对记者说：“明年我就要退休了。几年后，当坦赞铁路激活项目竣工时，我要带着家人，乘上崭新的列车，一直坐到达累斯萨拉姆。”

（据新华社电）

脑洞

□ 袁 勇

“蓝衣军团”拉胯源于差钱

“蓝衣军团”意大利国足的球迷最近很糟心。

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最后一轮，意大利队1比4惨败挪威队，错失直接晋级资格，只得进入附加赛。这是意大利队连续第三次被迫参加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，前两次全部折戟，均未能进入正赛。

一支曾四度捧起世界杯的球队，如今却为争夺一张正赛门票苦苦挣扎——意大利足球的衰落让人唏嘘。但这绝非偶然，其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因素。

足球圈有个共识，国家队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年前的青训成果。这一观点放在意大利队身上，尤为贴切。在如今的意大利队球员中，虽有能力突出者，但整体水平和20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同样的土壤，球员整体水准出现系统性下降，反映的是青训体系的持续衰退。

进入21世纪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媒介快速普及，欧洲足球进入发展快车道，球迷基础大增，赛事影响力和商业收入水涨船高。意大利足球联赛却受本国经济增长乏力拖累，从世界足坛的中心逐渐沦为二流联赛。

20世纪80年代之前，意大利是欧洲经济增长龙头，但此后经济结构转型

缓慢、增长日渐乏力。根据意大利独立机构OpenPolis的数据，剔除通胀和汇率因素影响，意大利民众平均年薪在1990年至2020年间竟下降了2.9%，成为欧盟唯一一个不升反降的国家。

经济困境对足球发展造成了显著负面影响：民众收入不涨，就没有太多钱进行体育消费；赞助商发展艰难，就难以拿出更多资金投资足球。意大利足协发布的报告指出，过去17年，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累计亏损达93亿欧元，债务增长了一倍，80%的俱乐部长期处于亏损状态。

同一时期，英格兰、德国、西班牙等国家的足球联赛影响力和商业收入却快速攀升。以转播权收入为例，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年转播权收入高达40亿欧元，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年转播收入却不到9亿欧元；英超冠军曼城能够获得1.79亿欧元的转播收入分成，意甲收入最高的国际米兰仅能分到6500万欧元。收入上的巨大差距，让意甲球队在吸引世界级球员、设施建设以及科研医疗等方面的投入，远远落后于英超和西甲等联赛球队。如今的意甲联赛，越来越难吸引到顶级球员加盟。没有顶级球员，比赛观赏性下降，吸金能力进一步受到影响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除了转播权收入存在差距，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经营模式也较为僵化。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多为传统私人企业拥有，一旦企业经营不善，俱乐部就会遭遇财务危机。相较之下，英国、德国和西班牙的顶级俱乐部大多已经实现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，通过会员制或公司化管理，甚至到证券交易所上市，显著提升了风险应对能力和商业开发能力。

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商业能力不足，营收乏力，青训投资也随之下滑。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打击了许多意大利家庭，让他们越来越难以负担孩子进入足球学校的学费，意大利足球的青训水平肉眼可见地下滑。2007年，意大利还有8000家顶尖足球学校，注册的专业及业余球员多达200万人；到2015年，注册球员数量已经锐减到120万人，足球学校数量亦减少四分之一，近90%招不满学员。青训退化，假以时日，迟早会反映在国家队的成绩上。

意大利足球的颓势，是长期积弊酿成的苦果，非短期措施所能化解。世界杯预选赛上的狼狽挣扎，给意大利足球界敲响一记警钟：昔日荣光已成历史，若不直面差距、深挖病根，稳步推进改革，重返巅峰只会是空想。